

# 扶助中小微企业不能玩花架子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施宏

近期,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明确具体的要求和任务,就是要通过集中精力抓好“六保”的各项工作来全面实现“六稳”的总体目标。在上述“六保”和“六稳”的相关工作中,由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关系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有效解决它们面临的房租较重、资金紧缺、供销不畅等现实问题应该成为重中之重。目前相关部门和地区陆续出台了  
不少扶助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和措施,但是也存在  
着一些玩花架子的现象,值得我们有所警惕和及时纠正。

有的地区出台一些消费券政策帮助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在当地拓宽销路,但是这些政策受益的范围、持续的时间和帮扶的程度都较为有限,而且消费券发放的渠道不够规范,政策执行的效果没有独立客观的分析,加上群众的反映和外部的监督没有跟上,难免“对上交差、对下应付”之嫌。

又如,疫情期间不少地区出台了减免房租的政策,但是普遍的做法都是对国有产权方给予补贴,再由其对符合条件的承租方降低租金。问题是非国有的产权方才是出租市场的大头,对于这些企业,各地在文件中一般仅用鼓励减租一笔带过。由于怎么鼓励没有落地,因此中小微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始终未见明显降低。

再如,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之一,在当前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更是“六保”“六稳”的关键环节。一些地区组织部分银行与中小微企业对接,中小微企业的利率是降低了一些,但是给政府指定的评估机构付费又使利率的降低打了折扣。最为重要的是,本地区有多少家中小微企业?怎么筛选出可以扶助的对象?降息的真实效果到底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当地政府内部往往口径不一。

还有,一些领导相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投入相应的精力和资源,他们更热衷于在争抢税源方面积极作为,因为短期可见的政绩和本地财政的利益都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税源大户方面。有的制定外地税源大户迁入本地的优惠政策,有的为稳住本地区税源大户不外迁提供财政补贴,这些措施要么破坏全国统一的税收秩序,要么增加本地财政的额外负担,而



政策受益的对象却是税源大户而非最需要扶持的中小微企业。

此外,国家虽然给中小微企业一些税收减免或者延迟纳税的照顾,但是优惠政策的执行还需与征管理规定相配套。一些企业反映,如果享受优惠政策可能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上游企业由于不能凭票抵扣进项税款,将可能导致不与之做生意或者要求其额外负担部分费用。

为此,我们建议:一是在不强调GDP指标的同时,还要结合“六保”“六稳”的总体要求细化绩效考核指标,切实把各级政府的注意力

扭转到国家强调的重点工作上,同时加强审计监督和外部监督,对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官员或者变相加大中小微企业负担的做法要加大惩戒力度。

二是引导地方政府在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上精准帮扶中小微企业。政府工信部门牵头统筹建立各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全面掌握和分析当地中小微企业的复工程度、就业规模、税款征收、市场监管、信用管理、经营困难和社保水平等情况,按类型精准地筛分和评价中小微企业,配比相应的扶植措施,从而高质量完成中央部署的相关任务。

三是运用经济手段切实调动出租房产的产权方减免租金的积极性。可以考虑把房产税的减免权限下放给各省,让其根据当地的情况通过减免房产税来鼓励产权单位降低租金,而享受这个减免的前提是确实给租户一定的租金豁免,将减免的房产税全部用于减免租金,并提供减免租金凭证。

四是严禁各级政府通过税收返还、财政奖励、行政干预等各种形式争抢税源的做法,以免破坏统一的市场环境和法定的税收秩序。五是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必须同步考虑征管措施的配套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 稳定经济基本盘 有效挖掘释放内需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要以内部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快速扩大有效需求,稳定中国经济基本盘,要采取一系列举措有效挖掘释放内需潜力,防止各类谨慎性储蓄大幅上升,同时,应提前规划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在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基础上,扩大各类服务和新型消费。

刘元春认为,“两新一重”建设必须强化统一规划,特别是要强化空间规划,防止重床叠屋。财政政策方面,要把握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积极财政政策须根据不同阶段矛盾来进行具体安排。

□本报记者 焦源源

### 快速扩大有效需求

中国证券报:当前经济已经呈现出良好趋势,未来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会有哪些?当前应如何有效挖掘释放内需潜力?

刘元春:当前经济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和复工复产超预期完成的基础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未来依然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疫情蔓延仍存较大不确定性。在沒有全面了解疫情机理和掌握有效治疗方法之前,未来1年至2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依然来自疫情的蔓延。

二是在疫情、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冲击下,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变异将与世界疫情共同构成我国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对于当前供需缺口认识不足,需求扩



张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四是在疫情冲击下,可能导致部分传统性救助政策和刺激政策失灵,并可能引发后遗症。

当前首先要战略上保持稳中求进、以保促稳,强化底线管理的原则,以民生为导向、支撑扩大内需,以内部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快速扩大有效需求,以稳定中国经济基本盘。其次要采取一系列举措有效挖掘释放内需潜力:一是全面对冲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提振各类经济社会主体信心;二是利用民生体系改革和建设,加速构建后小康时代的社会安全网;三是大力发展无接触经济和数字经济,减少疫情冲击,利用新基建、数字经济补贴等计划加快相关领域潜在消费和投资的转化和扩大;四是有效启动前期部署的各项市场化、法治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规划,加快民营经济投资的提振;五是提前规划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在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基础上,扩大各类服务和新型消费;六是在稳外贸的政策作用下,进一步挖潜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和投资市场。

### 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

中国证券报:在“两新一重”建设推进过程中,应警惕哪些问题?目前投资新基建项目的配套资金从哪儿来?如何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的活力和积极性?

刘元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升投资的方案,在推进工作中必须警惕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从总体上讲,不能“大车走老路”,按照老办法来实施“两新一重”,“要用改革的办法,要经过科学论证,按规律办事,不留后遗症”;二是必须强化统一规划、特别是要强化空间规划,防止重床叠屋,把“两新一重”应分离开来理解和实施,让不同部门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进行规划实施,会导致出现重复建设和不配套建设的问题;三是必须通过PPP、基础设施信托投资基金(REITs)以及特殊经营体等改革,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有效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动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和参与度。

新基建与旧基建在建设、使用和营运方面有很多差异,因此在资金来源方面应不断进行创新探索。一是对于新基建进行有效分类,针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在资金融通上的不同属性进行融资方案匹配;二是总结旧基建的PPP实施经验,加快推进PPP模式在新基建领域的应用;三是创新运用REITs;四是设立专门的新基建投资信托计划或者投资基金,允许信托机构从单一项目入手,提供长期债权资金;五是允许保险资金在融资工具创新的基础上参与投资新基建项目,以解决基金资金期限和项目建设运营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六是要根据新经济的特征来创新资本市场服务体系,提供股权投资工具或项目配套资本金,充分发挥科创板作用,积极推动在新基建领域比较成熟的企业上市;七是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通过发行新基建专项债券、设立新基建专项贷款等途径展开融资;八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拓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新型抵质押方式,探索收益权质押融资,发展能效融资、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支持工业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

### 保持财政政策弹性

中国证券报: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刘元春:一是必须对于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分解,把握清楚哪些冲击是疫情带来的,哪些是趋势性结构性的,哪些是周期性的,不能在沒有充分定性和定量分解的前提下就进行全面的简单财政扩张。

二是必须把握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这些不同阶段矛盾来进行具体安排。比如在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之后,必须针对市场有效需求缺口扩大的问题,快速加大对于大型项目、关键投资以及消费扶持等领域的资金投放和扶持。

三是必须根据财政政策落实的项目、领域和速度,对货币调控进行相应调整匹配,防止资金数量和成本带来的问题。

四是国债通过特殊转移机制向基层直达,必须进行机制体制创新,要求基层政府在疫情救助、基层资金补充、民生建设以及项目启动等方面进行科学统筹规划,防止因能力不足而带来的财政资金错配。

五是必须保持财政政策的弹性,在底线管理的同时具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机动性和可调整的空间。

中国证券报: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央行下半年会如何调整?

刘元春:央行近期政策调整,是为了应对目前短端利率过低引发各种问题的短期安排,并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下半年,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各类大项目开工,货币政策会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布局,进行数量和价格上的进一步灵活适度调整。一是M2增速和社会融资增速将随着名义GDP增速在三四季度明显反弹而进一步提升;二是通过降息降费等方式落实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要求;三是进一步创新各种工具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和直达性效果;四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在提高逆周期调节的同时,对脱实向虚和金融泡沫化倾向进行专项治理。

从6月初出台的两大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来看,直达性货币政策所涉及的资金面达到4.7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考虑到实际落实的情况,央行很可能进一步创新直达工具,进一步拓展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空间。

## 从“显”与“隐”看A股韧性与生机

□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钟伟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为世界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而A股却从容不迫地走在完善基础制度框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给市场参与者带来了不少惊喜。

### 中国金融体系加速融入全球

人们似乎多少还在留恋往昔的高增长,却忽视了全球经济周期的剧变。从全球增长来看,2011年初至2020年初,美国经济经历了超长景气,但十年平均增速和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相比,增长却弱得多。以最富有活力的通信产业为例,3G的普及始于2008年,4G的普及始于2015年,移动通讯给人类带来了一些新产业新动能,但却没有带来新经济周期。中国也不例外,从2011年三季度至今,中国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即便如此,中国经济增速已是GDP超过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的佼佼者,2020年更有可能成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体。

从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看,21世纪初,美日分别占27%和17%,中国约占7%;而当下则转为美日分别占17%和7%,中国约占约30%。但中国制造业利润的全球占比较低。在此背景下,中国已经走到了在核心技术、设备等领域必须攻坚克难之际,只有在高端价值链和核心产业链支撑下的供应链才不会被轻易去化。

与此同时,外资持续17个月对中国债市净流入约2万亿元;除个别月份外,对股市的稳定净流入也接近2万亿元,外资已成为中国股市债市靠前的机构参与者,国际可交易的主要金融指数在纳入和调高中国市场的权重。中国国际收支也渐变,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顺差,其重要性已不逊色于传统外贸的顺差。

### A股运行基础扎实稳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中国央行都需要在聚光灯下,就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给个坚定的说法。2015年第四季度和2018年第三季度,人民币汇率波动和A股市场之间出现共振,以至于人们习惯于认为,在中国“股汇同向”,汇率升则股市升,汇率不稳则股市不稳。疫情至今,也有美股的剧烈波动,也有美元指数急剧攀升,然而人民币汇率随市场双向波动,合理均衡。即便海外偶有对冲基金声称要沽空人民币或港币,也并未引起太大波澜。汇率问题逐渐淡出视野是个新近现象,既折射出金融开放和汇率深改之功,也体现出股市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成熟。

两会前后人们热议财政货币刺激方案会如何,却忽略了中国经济的两次爬坡。疫情之下,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强烈的刺激政策,欧美刺激力度普遍在GDP的8%以上,央行也更依赖量宽工具和零利率政策。两会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宏观政策的选择克制而不失灵活性。2013年到2015年二季度末,影子银行和高杠杆带来了股市异动;2015年末至今,影子银行体系的85%已经消失。不依赖于财税、货币等外在环境突变的A股市场,在过去四个季度运行却稳中有升,其支撑正在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迁和投资者对成长创新的珍惜。

如果我们不热衷于“显”,而将目光投注于“隐”,才能勾勒出未来的轮廓,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在趋势性收敛,金融体系开放深改有实质性收获,宏观刺激的阶段性拐点已过。中国股市也运行在更为扎实稳健的基础之上,年初至今,虽有疫情,但A股的韧性和生机,使我们以更为从容不迫,而不是用焦虑焦躁的心态,去观察和参与其中。



新华社图片